

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梁景和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梁景和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梁景和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097-4585-4

I. ①第… II. ①梁… III. ①中华文化—文化史—近现代—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7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6473 号

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 梁景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许 力

责任校对 / 徐兵臣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585-4

定 价 / 79.00 元

印 张 / 19

字 数 / 323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

目 录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	梁景和 / 1
当代史学功能和热点的转向	刘志琴 / 7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	李长莉 / 17
论五四时期的“独身主义”	罗检秋 / 25
民国时期避孕药物的广告	〔韩〕俞莲实 / 40
留日学生的反对山东出兵运动	
——以奈良女子大学收藏的校史资料为例	〔日〕杉本史子 / 66
忙碌的妇女：晚清城市富裕阶层妇女的劳动	
——以盛宣怀家族为个案的研究	王 燕 / 87
娜拉出走以后	
——论民国时期女性职业与家事问题	余华林 / 104
走向中国私密的历史	
——杨绛及其作品	〔美〕方哲升 / 125
从《女性改造》杂志看日中两国的女性观	〔日〕前山加奈子 / 149
太平洋战争前后对日和平工作的变迁	殷志强 / 155
20 世纪 30 年代电影在上海	
——以上海与京城比较为中心	〔韩〕李浩贤 / 170
20 世纪 20、30 年代北京民族风格近代建筑思想的历史	
考察	宋卫忠 / 189
1958 ~ 1963 年伤寒疫情流布及成因分析	
——以河北省为例	王 胜 / 198

灾害与文明：中西洪水神话传播比较	杜 涛 / 209
近代北京民间的四大门信仰与日常生活	李俊领 / 215
严复思想中的个人自由与公共性	区建英 / 233
个人主义观念的百年中国历程	高永平 / 244
榜样的力量	
——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劳动英雄的塑造	韩晓莉 / 257
中国政治学的诞生：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论析	毕 苑 / 276
“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栋亮 / 294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

梁景和*

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已经迈进了一个新阶段，在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内，深入思考和探索有关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更显得十分重要，也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据以往的学习体会，我觉得对下面的几对概念作一些研讨，有助于开展社会文化史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常态与动态

这里所谓的常态与动态是指历史发展一定的长时段内，历史事象的不变部分和变化部分的总合。不变部分即为常态，变化部分即为动态。这里的长时段是个相对概念，它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上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这要根据研究的具体事象和研究的特定问题意识而定。常态的历史事象指在一定的长时段内基本处于不变的历史事象，比如一直到清末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比如清代很多男人穿长袍马褂，很多女人穿旗袍；比如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我国基本上是以“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国人政治生活的指导方针；比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很多人以“大哥大”作为通信工具；等等。可见在几千年里、几百年里、几十年里、几年里都存在着相对常态的历史事象。动态的历史事象指在某个历史时期新出现的历史事象，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比如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共和制度；比如 20 世纪 60 年代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如 21 世纪以来的“闪婚”“裸婚”“滚婚”现象；等等。有些常态的历史事

*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象和动态的历史事象是相对而言的，其属于常态还是动态，这要由我们的问题意识而定。比如，若以新中国成立后为何会产生“文革”为问题意识，“文革”就是个动态的历史事象；若以“文革”时期中国人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为问题意识，“文革”就是个常态的历史事象。

还有，一个具体的历史事象在一定的时期内，也会存在常态和动态等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是由历史发展变化错综复杂的原因决定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餐饮生活，从动态上看，一些人吃起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但从常态上看，很多人并不吃这些食品；比如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炒起股票、买了汽车、住上楼房，但也有人炒股票、未买汽车、未住楼房，等等。历史是错综复杂的，由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当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有车族的时候，就不应当以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私家车而否定前者的研究；当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国民劣根性的时候，也不应当以相当一部分人的优良品格而否定前者的研究，如此等等。

相比之下，社会文化史更要注重动态历史事象的研究。历史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所以注重动态历史事象的研究本来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历史研究就是让人们去了解和认识历史，去了解和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特点。而研究动态历史事象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特征的基本路径。当然，动态历史事象和常态历史事象的分类是相对的，只要我们的问题意识明确，我们的研究就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进而消解作者和读者的模糊性或曰含糊性。

碎片与整合

前些年有人对社会史研究有些微词，认为社会史研究存在碎片化倾向，研究的历史现象似乎是些鸡零狗碎、残羹剩饭般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所以进行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这样的说法可能有其一定的道理。

问题在于，什么是碎片？以往的研究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和回答，这就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琢磨一下，所谓“碎片”，其一好像就是些摆不到历史台面上的无足轻重的“小玩意儿”，诸如洪秀全有没有胡子、张家媳妇多高、李家媳妇多胖之类。其二好像是那些按照以往历史研究的观念，似乎有些猎奇或看不出有什么所谓的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诸如研究妓女、乞丐之类。

如果说“碎片”研究是相对于“宏大”研究的话，那么“碎片”研究和“宏大”研究孰有意义呢？其实这是不能回答的伪问题。“宏大”研究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意义；“碎片”研究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意义。这要看你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比如就一般地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并用一些数字说明之，这样的“宏大”研究其实意义不大。如果深入下去，国家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富强了，又有哪些充分的表现，是哪些重要的原因促成富强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和阻力，是通过什么独特的路径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留下了哪些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样的“宏大”研究就显得有意义了。再比如“文革”期间，谁谁被揪斗了，某个文物被砸毁了，某个“走资派”自杀了，如果只是孤立地研究这些“碎片”问题就意义不大，如果把这样的“碎片”研究与更深层的政党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矛盾、领袖崇拜等结合起来，也可能会揭示出更为深刻的历史面目，这样研究的意义就显得大些。

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千姿百态，巨细相应，所以社会文化史并不回避“碎片”研究，但“碎片”研究正如上文所说，关键是你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除此之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要处理好“碎片”与“整合”的关系，即多种“碎片”研究之后可连缀成一体，这是社会文化史尤其看重的一点，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这有些像孩童们的拼图游戏，好多的拼图材料犹如“碎片”，把这些“碎片”材料拼合起来，让人豁然开朗，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崭新的并具有实际意义的图画，这是拼图的意义。而社会文化史把社会生活的“碎片”整合之后就有了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比如近三十年服饰的“碎片”研究，喇叭裤、西装、夹克衫、牛仔服以及色彩斑斓款式多样的女装，等等，如果把这些“碎片”研究整合起来，就会发现人们服装生活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中外文化的交流、审美情趣的改变、精神自由的提升，等等，这不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旨趣所在吗？

生活与观念

在中国大陆，有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我到目前为止也主张这样的看法。这里的基本含义就是指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而且重在研究两者

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怎样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形态,使人们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使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是两者的互动。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人大代表是通过普选而产生的,这种政治生活对民众的民主意识的提高和推进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了民众民主政治观念的变化。反过来,民众提高了民主意识又会对民主政治有更新的要求,也必然会促使民主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和变革。再如计划生育国策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家庭结构,这种家庭结构变化同时改变了家庭的教育观,在这种教育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当代的独生子女教育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状态。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社会生活不是简单地就促使了观念形态的变化,观念形态也不是简单地就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这里的错综复杂是需要多层面和多角度去不断地深入地探讨的。我们之所以倡导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其实就是要给研究社会文化史找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目的是使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能够有一个起点,好让研究者首先迈开步子,使研究能够开展起来,以促进历史研究的丰富和发展,让一些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者也为史学研究作点贡献。

当然,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和强调生活与观念两者的关系和研究它们的重要意义。人都要生活,人都有观念意识。不同时代的人在怎样生活,有怎样的生活观念,自然需要进行研究。人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有怎样的生活观念,也需要有历史的借镜。这是人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么社会文化史对生活 and 观念进行研究与探讨,也就有了实际意义。

一元与多元

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生活要有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眼光。一元与多元都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探讨的范围,从这个维度讲,社会文化史研究所面向的领域是宏阔和博大的。

首先,社会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而狭义的社会生活是指一般性的日常生活。这里看得很清楚,广义的社会生活是多元,狭义的社会生活是一元。社会文化史可以从一元的社会生活入手对日常生活进行探索,再渐次扩展,

向广义的社会生活推进，逐步扩大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地。

其次，狭义的社会生活即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日常生活是指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等。广义的日常生活指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扩展开来的日常生活，比如当代社会的旅游观光、流行时尚、网络信息、心理卫生、消费娱乐、装饰美容、求职就业，等等。狭义的日常生活是一元，广义的日常生活是多元。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注意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首先关注具体问题，然后逐步探索具体问题与其他问题的诸多联系。

再次，就狭义的日常生活而言，也存在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若干事象，其中任何一个事象与其他事象之间都属于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看来，我们这样的划分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使我们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繁博丰厚的景象。虽然层次可以无限地划分，每个层次也都可以寻求一元和多元的多重关系，但是历史事象的中心层次和重要层次以及重要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判定的，这样的判定有助于我们遴选历史的重要问题，对历史重要问题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从事具有实际意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工作。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元和多元的辩证眼光，有益于我们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进行多层面和多维度的分类；有益于我们识别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和研究价值；有益于我们循序渐进地开展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真实与建构

研究历史要求真，要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真实是历史研究的本质，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时，历史研究还需要建构。所谓建构是历史工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把握，站在特定的立场，运用相关的理论方法，对历史事象（包括历史呈现的形式及其本质规律）进行阐释的一般性模式（或曰模型）。建构需要最基本的条件，这就是上文所谓的一定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素材，这是我们建构的基本材料，是最原始的资料依靠。研究者要站在特定的立场上，不同的立场研究问题的视角是不同的，所以得出的历史结论会有差异。研究历史问题要运用理论方法的指导和规范，理论和方法可以是研究

者自己的创建与发现。历史的呈现形式是指历史的外象，是可见的。本质规律是指历史的内在感知，是看不见的，是可以认识 and 理解的。而一般性模式是指通过文本、图像和声音等多种形式表现出的历史事象。

历史的建构需要关注几个问题：其一，语言、概念与结构。语言要质朴、准确、流畅、精练、优美，不主张语言的佶屈聱牙，读起来费解。要根据研究，提炼出必要的新概念，新概念要界定明确。结构不要八股化，根据研究的需要和研究的意义进行合理设置。其二，想象求真。历史是研究过去，建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想象以求历史的真实。这种想象是有条件的，是在多种证据基础上的想象推理和逻辑论证，想象是形象的推理和论证过程，史学研究的想象力是还原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其三，建构包括理论方法的建树，历史研究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价值，其中对理论方法的创建就是其中的一种意义。理论的建构有助于我们分析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而方法的创建同样有益于我们研究历史和建构历史。其四，历史学是艺术。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是人文科学，同时历史学也是艺术。说它是艺术不仅仅是说它可以通过艺术形式来展现历史，为艺术形式提供素材，更在于研究者提供的历史研究成果能给接受者以艺术的感染和享受。这对历史研究的艺术性要求是高层次的，也是很难的，也就需要去建构。当然，这要求研究者和接受者两者的统一。我们不要求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呈现艺术的魅力，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对历史研究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并要试着践行。

社会文化史繁盛庞杂，研究的困难很大，凭借“建构”的思维方式有益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的拓展。

当代史学功能和热点的转向

刘志琴^{*}

前言

一、史学在中国一度是最辉煌的学问，遭受破坏也最严重，信誉的丧失使史学失去公信力，娱乐化又冲淡了史学的严肃性，当代史学已从学术中心走向边缘化。

二、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是史学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这种变化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三、史学功能和主题的变化，是史学面临转向的新机遇，从开拓新领域中获得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史就是从另一个视角发掘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

一 当代史学走向边缘化

史学在古代中国是最辉煌的学问。中外学问的传统并不相同，如果说古代西方学术以哲学为代表，中国就以史学最出众，因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古老、最神圣的学问，其资料积累的丰富和详实可以独步世界史坛。

近代思想家郑观应说：“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数义所生。”经史著作被尊为经典，受到人们的崇拜，左右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是以经学

^{*}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为代表,这无异于说是以史学为代表、经史不分是为古人治学的传统,清代章学诚就以“六经皆史”说揭示了这一实质。所以古代中国在各种学问中以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中国也最受朝廷的尊崇,领衔史官的往往是宰相级的人物和最有望望的大儒。古希腊、罗马可以随时随地讨论学问,站在路边演讲,听凭众人围观,因此有人干脆称之为“广场哲学”,而在中国讲史论道则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听讲者毕恭毕敬,讲坛犹如神坛。

正因为如此,对治史者要求甚高,首先要有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的道德操守。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员,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听命于朝廷,为君主服务,是史官的职责。但是,史官在信仰上可以从道不从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因而对君命有所距离,为此有人不惜献身亡命。所以传统史学虽为御用学术,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独立性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制度保障,却为道义所标榜,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史学传统的荣耀。

如今的中国,史学已从学术中心位置边缘化,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史学的公信力在下降,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步履维艰,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实际情况是,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史学较之文经哲三界,明显滞后。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天津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怀疑,被告了黑状,遭到批评,其他可想而知,说是沉默的史学,正是少有作为的写照。

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遭受的破坏最严重,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文化也随之变迁,当新学科引进和传统学科吐故纳新时,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在转型中一度走向畸途。举例说,“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专家学者被打倒,史学界一片凋零。曾几何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读史书,各种古籍、史学读物层出不穷,出版

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空前绝后。正常的社会，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晓，可三十多年前有人说吗？1958年出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7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字不提，真相又在哪里？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从1949年到1979年历史被掩盖了30年，误导了两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有人推断，这是想隐瞒国民党抗日的事实，因为承认南京大屠杀，就要承认南京保卫战，这恰恰是国民党领导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我们历史学家的悲哀，对民族救亡尚且如此，其他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又有多少？虽然古代史远离现实而幸免这一遭遇，但同为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这不是某一时段的问题，而是对史学公信力的严重损伤，史学界要重建诚信，必须说真话，非有大智大勇不能澄清真相，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史书的信誉在下降，而戏说历史的各类书籍、讲坛却受到读者的欢迎，越来越兴旺。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和内容的变化，在市场上走俏的如《明朝那些事儿》《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正经》等几乎都是非历史专业作者所撰写的。史学图书的作者从史官、学者，到非专业作家，是述史主体的大变化。这些业余作者之所以拥有专业史家所不能拥有的广大读者群，是因为所述的内容具有颠覆性。从来史家说什么都要有证有据，是史家的意见都要标明，如太史公曰，某某传、注、著等，都是对历史的实说和点评，讲究的是历史真实性和启示性。即使明清时代的讲史带有演义性，但其伦理说教仍然不脱正史的价值。如今不然，讲史中有自说自话的、戏说的、臆说的，在中央电视台讲宋史的宣称自己是在“玩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并不在乎什么史实不史实，只要读来解闷、解气就是好！史学本是一门纪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矫情，古代一些史家为秉笔直书，送掉性命的大有人在。娱乐渗入这门学科，真可算是娱乐至死了，可死的不是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这是专业史家难以认同而又无可奈何的现象！

对此也要有所理解，对历史的嬉笑怒骂是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的表达方式，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有一处讲到朱元璋，说到他一上台，就来个

“文化大革命”，杀功臣！观众一看就乐了，其实引起读者兴奋的不是朱元璋，而是“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讲“文革”有禁忌，只能借历史来比喻，如果对“文革”能敞开胸怀来批判，人们也就不稀罕以朱元璋说“文革”了。由此可见，如果言路畅通，读者能随意评头论足，又何须转弯抹角来议政呢？到那时此种讲坛也就火不起来了，求真将再度成为人们读史解惑的追求。学历史的比常人更胜一筹的是，可以以历史的眼光来解读现实中千奇百怪的现象。

二 史学功能在变迁

如今的中国，辉煌一时的史学已经光辉不在，无可奈何花落去，面临的是被解构。所谓解构是史学的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全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其变化波及面之大、来势之迅猛，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有神谕的性质。尚者，上也，是上帝之书，阅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权之重，凛然不可冒犯。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是孔子记录的鲁国兴亡史，史书从此从记神事走向记述人事，《史记》《汉书》都承继这一传统。之后，纪传体、本末体问世，与编年体合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三大体裁。这三大体裁使古人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更为完整与准确。《资治通鉴》阐明史书的价值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一语道破，史书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20世纪初是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由梁启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以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将平民百姓推向历史的前台，史学研究中心转移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西方在20世纪末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号称大文化史，成为一大流派，中国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已提出这一主题，遗憾的是由于中国

革命发展的形势，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诸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史学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20世纪史学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而又提出“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所谓史学的“五朵金花”即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虽然在学术上是有价值的，但又都有强烈的政治性，所要阐明的是共产党的基础理论社会发展史，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由此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这可视为《资治通鉴》的现代版，只是内容从以帝王将相为主变为以农民战争为主。不同意见者如尚钺、傅筑夫、孙祚民都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而遭受批判，以政治暴力扼杀了讨论的学术价值。

由于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目的决定方式，其思维习惯、文本表述以及选材取料等手段大同小异，导致内容的枯燥和贫乏化，凡是写农民领袖的几乎千人一面，写到失败处都要带一笔农民局限性云云，从先秦到清末一种格式，上下几千年，皆可挪用，简单化、标签化成为挥之不去的通病。史学界的前辈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对这种倾向都有所批评，但都难以缓解。问题在于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人人都是螺丝钉或驯服工具。要歌颂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成为热点，“文革”前17年以太平天国文章最多，3000多篇，居各类论文之首。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枯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

由此可见，史学功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发生变化，史学被推崇为神谕，是在神权时代；被认为是《资治通鉴》或政治教科书的，是在皇权时代。代代相承的小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前人经验就是后人的轨迹，人们匍匐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趋，事事按祖制办事，间有革新也要打着法祖的旗号，即使至尊至贵的君主发号施令，也得标榜来自祖先的训示。代代相因的社会造就尊祖敬史的社会心态，治国理政只要效法祖先，就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凝聚效益，因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论这句话行得通行不通，都反映小农经济形态中习惯性的